

高教信息

2021年 第4期 (总第97期)

主办: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发规处(高教所)

出版时间: 2021年8月15日

本期导读

【高校书院制建设】专题

- **要闻播报**..... 1
 - 河南省高等学校书院制育人模式改革现场交流会召开..... 1
- **热点聚焦**..... 3
 -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召开书院制育人模式改革专题报告会、座谈会..... 3
 - 郑州大学召开书院制领导小组工作会议..... 5
 - 书院制+导师制 郑州航院启动大学生科技创新雨露计划... 7
- **高教参考**..... 9
 - 新中国成立以来书院研究的梳理与反思..... 9
 - 推进构建“书院制”人才培养新体系..... 27

【编前语】近年来，实施书院制教育成为中国高校教育改革的一种积极探索和有效尝试。书院制教育是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积极探索，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育人模式的创新之举，有利于完善双院协同育人体制机制，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协调发展、同向同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本期《高教信息》汇编了相关会议报道和部分专家、学者观点，供学校领导干部、教学科研工作者参考交流。

●要闻播报

河南省高等学校书院制育人模式改革现场交流会召开

4月25日至26日，全省高等学校书院制育人模式改革现场交流会在郑州西亚斯学院召开。省委常委江凌出席并讲话，副省长霍金花主持。

江凌指出，书院制改革是现代大学育人模式的创新，是深化“三全育人”改革的有力举措，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有利于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有利于增强人才培养的时代性，要提高思想认识，以书院制改革为突破口，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高校综合改革。江凌强调，要真正转变观念，广泛凝聚共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大要求上，统一到变革高校育人模式的深入思考中，凝聚合力推动书院制改革走深走实。要健全体制机制，构建书院体系，统筹好书院与学院的关系，整合好书院与学院的资源，结合好理论学习与实践活活动，因地制宜、因校施策，积极稳妥探索构建书院与学院分工协作、相辅相成、协同育人的培养模式。要运用系统思维，坚持统

筹兼顾，确保书院制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河南科技大学、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郑州大学等 4 所院校作了交流发言。会前，江凌、霍金花深入郑州西亚斯学院明礼、启贤、寰宇 3 个住宿书院调研。

（来源：新华网 2021 年 4 月 26 日）

● 热点聚焦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召开书院制育人模式改革 专题报告会、座谈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河南省“十四五”时期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指导意见》和《河南省高等学校探索书院制育人模式改革的指导意见（试行）》精神。6月8日上午，我校召开书院制育人模式改革专题报告会，邀请汕头大学德馨书院党总支书记张丽婷作题为《小社区、大教育——汕头大学“书院制”介绍》专题报告。校党委书记王清义，党委副书记、校长刘文锴，党委副书记高京燕，副校长施进发、苏喜军、刘雪梅、刘盘根，纪委书记王如厂出席，校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和部分单位的全体同志聆听了专题报告。报告会由苏喜军主持。

张丽婷向与会领导和老师介绍了汕头大学的建设发展史，并结合汕头大学书院制建设经验详细讲解了全国当前倡导书院制育人模式改革的深刻内涵。从行政改革、人事改革、财务改革、管理改革等方面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和服务质量提升；从完全学分制改革、课程改革打破行政班级界限，到实现住宿书院改革；最终形成学院重“教”，抓专业知识、科学精神、思维方式、全球化视野培养，书院重“育”，抓社会责任、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健康体魄养成，双院协同、双轮驱动的特有人才培养生态系统。随后，张丽婷结合书院制建设的中西对比、古今对照、内涵、外

延展开讲解，详细阐述了学院与书院在教育管理中的分工协同，介绍了汕头大学书院建设的组织架构、人员设置、育人模式、党建引领、基层团建、协同育人等方面的宝贵经验。

苏喜军代表学校对张丽婷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她的精彩报告和无私分享表示由衷的感谢，并要求与会老师要认真学习、深刻体会书院制育人模式改革是我校更好地适应新时代高等教育新形势、新任务、新形态、新要求，推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有力保障和重要举措。

报告会结束后，在高京燕、苏喜军的陪同下，张丽婷在第六会议室与书院制育人模式建设改革的相关学院、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开展座谈，座谈会由高京燕主持。座谈会上，与会老师针对书院社区模式建设、制度建设、物理空间拓展、混住模式管理、评价体系、育人成效、师资配备、人员分工、培养方案、党团建设、评优评先等方面开展了深入探讨，张丽婷结合德馨书院建设实际，对每项问题给出详细的阐释说明，并代表汕头大学邀请我校教师前往开展经验交流。

（来源：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新闻网 2021年6月9日）

郑州大学召开书院制领导小组工作会议

1月3日，郑州大学在主校区综合管理中心第五会议室召开书院制领导小组工作会议。校领导王宗敏、李兴成、谷振清、张倩红、韩国河、吴宏阳、赵明皞出席，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书院制领导小组组长、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王宗敏主持会议。

王宗敏以《郑州大学书院制研究与思考》为题，介绍了书院制的起源、发展与内涵，英、美、港大学的书院制模式比较与启示、书院制大学教育在中国高校的实践。在分析书院制大学模式利弊分析、我国大学书院制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矛盾与难题基础上，他谈到了关于书院制的郑大思考。他强调书院制改革实质是人才培养模式的系统性改革，是空间服务于人才培养模式的全面整合，是一种有意义的教育探索和实践，郑州大学有基础、有动力、有能力推行书院制，要进行有益尝试和探索。在推进策略上，要强化顶层设计，做好总体谋划，制订合理的实施方案，多校区不同模式试点推进。

与会校领导结合书院制实施过程中，就如何更新教育理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资源配置、拓展物理空间，解决好学院与书院的双重关系，充分挖掘书院育人功能、打造适应郑大本科规模的通识教育等方面分别做了发言。与会校领导一致认为书院制改革是人才培养工作的一项重大、复杂、系统性工程，在工作中要充分调研、科学论证、先行试点、慎重推开。在操作步骤上要科学制定十四五规划专项方案，以规划为引领，确保文化定位、

物理空间、导师配备、管理模式等科学合理，保障到位，确保书院制落到实处，取得成效。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围绕书院制改革的现有基础和实施策略分别做了汇报交流。

（来源：郑州大学新闻网 2021年1月4日）

书院制+导师制 郑州航院启动大学生科技创新雨露计划

4月1日，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大学生科技创新雨露计划启动仪式暨材料学院——蓝天书院导师见面会举行，该计划对大一学生实行“书院制+导师制”，对学生进行科研指导。

启动仪式上，蓝天书院发布《大学生科技创新雨露计划实施方案》。依据《实施方案》，大学生科技创新雨露计划将依托各教学院部的导师资源，结合导师科学研究方向与需求，建立书院学生参与其中的科学研究课题库；书院学生将根据兴趣爱好自愿选择科学研究课题；导师定期对学生进行科研指导，开展科研启蒙教育。

据了解，郑州航院是河南省公办高校最早启动书院改革的高校，经过三年的探索，育人工作卓有成效，育人活动扎实开展，形成了一批育人品牌，也积累了一定经验。

导师见面会上，郑州航院副院长李捷介绍，大学生科技创新雨露计划是学校落实导师制的重要举措，是导师制工作迈出的关键一步，要以此次启动仪式为契机，真正让导师制成为打开学生科研启蒙教育之门的钥匙。他表示，蓝天书院要以获批河南省书院制建设试点单位为契机，各学院导师要针对大一学生的心理特点和知识储备，精心设计培养计划，让学生在导师的引导下逐步融入项目、融入团队、融入学科，不断激发学生的科研兴趣和创新思维，充分发挥导师制的最大功效。进入课题组的同学要把学习作为自己的第一责任，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珍惜学校汇

集的优质教育资源，养成良好学习习惯，持续夯实理论基础、不断磨练意志品格，把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精神贯穿于大学生涯的全过程。

据悉，通过前期的导师遴选、题目筛选和师生互选，此次双院协同，共建立起近 50 个科创团队，近 200 名学生加入，已初步形成了师生共创、合作共进的良好开端。

（来源：河南新闻网 2021 年 4 月 3 日）

● 高教参考

新中国成立以来书院研究的梳理与反思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教授 肖永明)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它萌芽、肇始于唐代，定型、兴盛于宋代，普及于明清，最终在清末因改制而退出历史舞台。在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书院虽历经曲折，但就总体趋势而言，则一直呈不断发展、壮大之势。到清代书院发展的鼎盛时期，书院总数达 4300 余所，遍及全国城乡。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荒陬边陲，都有书院。在中国文化史、教育史上，书院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如此，书院还越出国界，传入日本、朝鲜、越南、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与文化传播的窗口。

1901 年，光绪帝颁布废书院诏令。此后，虽然书院精神的某些侧面仍然存续于近现代教育体制之中，甚至还出现了以书院命名的一些文化、教育、学术机构，但书院作为整体已经在制度层面退出了历史舞台。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伴随着对书院改制的反思及对书院制度的借鉴，学者们对书院的研究也渐次展开。1923 年 12 月，胡适发表《书院的历史与精神》一文，1924 年 2 月，又发表《书院制史略》一文，感慨“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这两篇论文对书院由唐代到清代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追溯，阐述了书院制度在不同阶段的特点，并从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两个方

面对书院的精神进行了总结。以此为滥觞，书院研究不断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众多学者对书院进行了多层次、多方面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自 20 世纪 20 年代至今，国内外学者已发表有关中国书院研究的论文超过 3000 篇，出版专著 100 多部，可谓成果丰硕。

新中国成立以来，书院研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在前三十年，受时代氛围的影响，书院在国内被视为封建文化教育制度的组成部分，其形象相当负面，书院研究也趋于沉寂，海外也少有影响较大的研究成果。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学者们在大量积累、发掘书院研究史料的基础上，在研究内容、方法、范式上推陈出新，取得了丰硕成果。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书院文献的整理、书院史研究、书院制度研究、书院与文化研究四个方面，对七十年来的中国书院研究作一大致梳理。

一、书院文献的整理

学者们对史学与史料之间关系的理解或有不同，但对史料在史学研究中根本地位的认识却是一致的。对史料的充分掌握，是研究开展的基础。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书院文献的整理逐渐受到关注。在书院文献的影印方面，1995 年出版的《中国历代书院志》（赵所生、薛正兴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一书，收录书院志、书院课艺、章程、语录等文献 111 种，影响最大。近两年来，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文献丛刊》（已出版两辑，第一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 年版；第二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9 年版），第一辑收录书院文献 125 种，第二辑收录 134 种，是近几十年来书院文献整理中最为突出的成果。在书院文

献的专题汇编方面，20世纪末有陈谷嘉、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利用最为广泛。其后，邓洪波又整理出《中国书院章程》（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书院学规集成》（中西书局，2011年版）等书院文献。在书院文献的点校方面，自1995年以来，学者们点校的书院志共计20余种。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书院文献的整理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中国书院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书院史研究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有一些学者关注书院发展的历史，并产生过一些有影响的成果。新中国成立后，书院作为封建时代的教育制度，在这一时期成为批判的对象，因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难得一见。“文革”结束之后，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展开，学界思想进一步解放，在80、90年代形成了书院史研究的高潮，为后续的研究打开了局面。本文从书院史的通论性研究、断代书院史研究与区域书院史研究三个方面加以梳理。

（一）通论性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不少学者反思“文革”，拨乱反正，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他们将目光投向书院，试图呈现书院的历史面貌。在短短十几年时间中，就产生了几部很有影响的书院史通论性研究著作，其中1981年出版了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宋元明清书院的演变及其内容》（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陈元晖《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两部著作。同一年，海峡对岸出版了张正藩《中国书院制度考略》（中华书局，1981年版）一书。故此，1981年堪称书院

史研究的丰收之年。这也反映出当时学界对书院这一主题的关注与重视。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宋元明清书院的演变及其内容》一书在详细辨析书院涵义、归纳书院特点的基础之上，对宋至清书院的建置、传授学术内容及方法的演变作了梳理，并对书院的学风进行了总结。该书最主要的特点，在于结合不同时期的主流学术思想来讨论书院的演变，将学术史与书院历史结合了起来，这对后来的书院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元晖《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对书院在各代的发展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讨论，总体内容较为简略，唯对书院在教学上的特点概括甚详，反映出其对现实教育的关怀。而《中国书院制度考略》是张正藩之前发表论文的选辑，第一至五章探讨唐代至清代书院之起源、规制、演变及其影响，较成系统。其后六章分别探讨宋初四大书院、明末东林书院、中国古代书院的特点、书院讲学与学术关系等专题。其中，第十一章“中国书院制度对韩国的影响”是较早探讨中国书院与东亚其他国家书院关系的文章。

不难看出，20世纪80年代的三部通论性书院著作在不少地方借鉴了民国时期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两部著作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在研究内容、方法、范围甚至相关结论方面，它们都表现出对民国时期书院研究的吸收与继承。当然，这三部著作也取得了不少突破与创新，如对书院官学化、中国书院制度对其他国家的影响等内容的探讨，拓展了书院研究的内容。

1994年，李国钧主编的《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出版，该书是书院研究中集大成的著作。全书分五编、二十

二章，主要介绍唐至清时期的书院历史、书院教育、书院与学术等内容。该书采取宏观概览与具体案例相结合的方法，在论述每一时代的书院时，先以总论阐明该时代书院发展的特点及书院与科举、书院与学术的关系，而后以大量篇幅论述著名学者创办兴建书院、书院讲学活动、学术群体的书院活动等内容。与 80 年代的三部通论性著作相比，该书取材丰富，不但在呈现书院制度方面更为详尽细致，而且，该书关注书院在不同时期的教育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弥补了以往研究中的疏漏，颇具启发意义。此外，该书延续了《中国书院史话》的风格，将书院的历史与学术学派的发展、变迁相结合，深刻影响了后来书院与学术关系研究方式。

邓洪波所著《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 年版）是书院研究中另一部重要著作。邓氏长期从事书院研究，积累了大量素材，在广泛收集史料、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唐至清各个时期书院的特点、功能形态、数量及区域分布都作了细致的分析，在呈现书院的整体规模、分布特点及不同时期书院的特色方面，远较前述几部著作详尽，分析也相当细致，在论述中屡有新见。如果说李国钧《中国书院史》更多呈现的是书院历史的纵深剖面，邓著则为读者呈现了不同时期书院波澜壮阔图景。

总体而言，这些通论性著作各有侧重，也各具特色。有的抛开了民国时期以资料汇编呈现书院历史的形式，将史料融汇于论述之中，梳理书院历史发展的脉络；有的不再停留于呈现不同时段书院规模变化的大势，而是试图深入探讨书院与教育、政治、学术等的联系，呈现历史演变的复杂过程。这在广度与深度上都大大推进了书院研究的发展。

(二) 断代书院史与区域书院史

宋代是书院兴盛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书院形态、士人创办书院的理念以及书院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在书院史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陈雯怡《由官学到书院——从制度与理念的互动看宋代教育的演变》(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版)一书, 在吸收并反思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 通过观察南宋朱熹等人倡导的私学理想如何具体落实为士人的书院活动, 以及形成后的书院制度又如何决定了教育理念的方向, 揭示出宋代教育重心由官学向书院转变的过程。陈雯怡的研究, 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结论上, 都取得了很大突破。

元代是中国书院发展的重要时期, 元代书院的官学化问题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徐梓《元代书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版)一书, 关注元代不同时期书院政策之演变及其具体表现形式, 重点探究了元代书院官学化的问题。徐梓认为: “元朝政府对创建书院报批手续的严格控制, 层层审核; 把书院完全纳入统一的学制体系, 从行政管理(委派山长)和经济基础(拨置学田)两方面入手, 强化对书院的管理和控制; 现职官员以一级政府的身份, 参与书院创建; 这三个方面, 是元代书院官学化的最典型体现。”元初的书院政策较为积极, 其后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 通过严格审批程序、委派山长、拨置学田以及各级官府直接创办书院等形式, 加强对书院管理、控制, 致使书院“官学化”。这一问题, 后来也为台湾学者陈雯怡所关注。陈雯怡在《元代书院与士人文化》(收入《中国史新论: 生活与文化》, 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版)一文中, 重点探讨了书院官学化的问题。

她将书院置入元代具体的时代背景之下(儒户政策、理学的正统化),分析了书院在其时的特质,以及在社会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她认为,元代书院的官学化既造成了元代书院的兴盛,也显现出书院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边缘化,这一现象,“应当放在大蒙古国以来以崇祀孔子作为儒学象征的脉络中理解”,可见朝廷是将书院作为儒士出路的安排渠道,并不控制书院发展。

时代愈是靠后,文献存留越多,学术研究越是精细专门,书院研究也是如此。学者围绕明、清两代某一专题的研究成果众多,但综合性研究反而薄弱。在国内,有关这一时期书院研究的成果主要有白新良《明清书院研究》(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白氏之前著有《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曾于1995年由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经修订,改名为《明清书院研究》。该书主要根据地方志中的记载,以数量统计的方式呈现明清两代书院发展的大势,并对各省的情况作了统计。该书对清代书院发展趋势的梳理尤为详细,可谓一部“清代书院兴衰史”。外国学者对明清书院的研究也有较大的兴趣,且成果众多。日本学者大久保英子《明清书院の研究》(国书刊行会,1976年版)一书,分明清书院概观、书院的地域分布、明代书院与庶民阶层的兴起、清代书院与商人、戊戌变法与书院五个专题探讨明清时期的书院,着重揭示明代书院教育的平民化以及明、清商人与书院的关系两个问题。该书以社会史的研究视角,关注书院与社会的关系,其研究方法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也为后来学者树立了典范。美国学者约翰·麦斯基尔(John Meskill)著有《明代书院散论》(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该书主要探讨明代书院在中国书院史中的地位、

明初期的书院、明代书院的复兴、明前期书院的建造与活动、改革中的书院等内容。书中所论及的议题，有些是国内学者早已关注过的，诸如书院与佛教之关系、地方官员在书院兴建与维持中的地位等；有些则是较新的课题，例如对书院中祭祀孔子使用画像的探讨。此书在美国学界颇有影响，《美国历史评论》称赞该书是“领域的奠基之作(Foundation)”。将此书与白新良先生的著作对读，可以看到中外学者在书院研究方法视角、材料的选取与解读方面的差异。

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书院研究热潮影响之下，书院研究向地方扩展，区域书院史研究蔚为大观。其主要研究成果，有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 年版)，胡昭曦《四川书院史》(巴蜀书社，2000 年版)，吴洪成、刘园园《河北书院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邓洪波《湖南书院史稿》(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 年版)等。这些著作涵盖历史时期区域的书院盛衰情形、数量规模、管理制度、学术倾向等方面的内容，呈现了区域书院历史的整体状况。与民国时期的书院研究相比，这些研究成果无论是在材料使用上，还是在观点的突破上，都有长足的进步。一些地方的书院，因其在区域乃至全国的影响，材料存留丰富，学者关注较多，也取得了不凡的研究成就。如杨慎初、朱汉民、邓洪波《岳麓书院史略》(岳麓书社，1986 年版)，李才栋《白鹿洞书院史略》(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王立斌《鹅湖书院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2019 年版)等，这类研究多是在梳理各书院历史的基础之上，探讨其制度，发掘其在不同时期与主流学术的关系，对某一书院的历史轨迹与发展情形进行

了较为全面细致的分析。

三、书院制度研究

民国时期的学者出于对当时新式教育的反思，关注中国传统教育，希望从中获取有益的资源，这促进了中国古代书院的研究。在现实关怀的引导之下，他们对书院教学、管理、藏书、讲学等活动的研究热情尤高。书院制度研究是书院研究的重要部分。至20世纪80、90年代，受书院研究的热潮影响，学者们重新探讨了这一主题，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

一些通论性的书院史著作，虽然其研究重点在于历史时期书院的整体状况，但对书院讲学、藏书、祭祀等内容也有所涉及。如前文提及的陈元晖《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一书，其主要探讨了书院的历代发展情况，但也涉及了书院学规、讲会制度、书院祭祀等内容。这与民国时期学者所著通论性书院史重在叙述书院发展变化的风格很不一样，表现出更为全面的研究视野。

90年代以后，随着相关研究成果的积累，研究内容也不断深化，开始出现一批有影响的著作。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是关于书院制度研究的重要著作。该书对书院的类型、等级、职事类别、藏书、刻书、经费及管理、教育特点、考试制度等方面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诸多新论，大大推进了书院制度研究的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同是对“书院制度”的表述，民国时期的学者将其视为一个整体，涵盖书院全部的历史，与官学制度相并列。这一时期有关“书院制度”的论著，其主体内容也是书院的历史，

间及书院的活动。八十年代以后，在学术话语中，“书院制度”的所指发生变化，学者们多将书院的运作形式、书院活动视为书院制度，与书院兴衰的历史分别开来。这一变化的本身即反映出新时期书院研究的深入、细化。

讲学历来被研究者视为书院的重要教学活动，无论是前述通论性著作还是断代书院史，都有大量篇幅介绍书院讲学，将讲学、讲会理所当然地视为书院的重要活动。陈时龙《明代中晚期的讲学运动(1522-162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对明代中后期讲学运动有十分细致的研究。作者从纷繁的史料中为读者梳理出明代中晚期讲学活动的脉络，并归纳了明代讲学运动的特点及讲学运动的变化趋势。陈时龙认为，讲会并非书院的内部教学活动，它更像是一种社会活动。这就启发我们从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书院讲学”“书院讲会”这些议题。王崇峻《明代书院讲学的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以书院讲学为线索，围绕明代三次禁毁书院，梳理了书院讲学的起源，明代书院讲学的兴起，以及讲学与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有关明代书院讲学的研究成果甚多，如李国钧《中国书院史》、陈时龙《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等，但王氏利用甚少，这影响了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有关书院藏书、刻书的研究，有肖东发、赵连稳《中国书院藏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和赵连稳、朱耀廷《中国古代的学校、书院及其刻书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两部较有影响力的著作。肖东发、赵连稳对书院藏书的历史、藏书

来源、藏书的管理与利用、藏书特点以及书院藏书的意义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学界论及书院藏书者，大致不出上述这几部分内容。书中对 16 个省份的 36 所书院的藏书情形作了大致梳理，也值得参考。《中国古代的学校、书院及其刻书研究》一书，第八至十一章论及五代、两宋、元、明、清前期的书院刻书活动，是笔者所见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少有的对历代书院刻书活动的较长时段梳理成果。

祭祀是书院重要的日常活动之一，民国时期学者对书院祭祀关注甚少。近三十年来，学者对书院祭祀的功能、意义多有探讨，取得了不少成果。生云龙《中国古代书院学礼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一书对书院祭祀探讨甚多。该书将书院日常的祭祀活动与会讲礼仪统归入学礼，梳理了唐代至清代的书院学礼、学仪；归纳了书院学礼、学仪的特点；分析了书院学礼中的学理；并对书院学礼在书院教学活动中的意义及其文化价值作了探讨。肖永明、唐亚阳曾论及书院祭祀在确立、增强士人对儒家道德伦常观念的认同，引发士人对儒学的信仰，激发士人道德使命感与责任感，以及书院在社会教化方面的功能。其后，蒋建国对肖、唐两人的研究做了补充，他在《仪式崇拜与文化传播——古代书院祭祀的社会空间》一文中，从制度和文化层面分析书院祭祀活动的社会意义，揭示其在文化传播方面的功能。

四、书院文化研究

书院既是教育组织，也是学术研究机构。千年来的发展历史，赋予了书院深厚的文化内涵。20 世纪 80 年代，很多学者从思想文

化层面反思“文革”，开始重估传统文化的价值。受此思潮影响，书院文化研究趋于兴盛。这一时期成果不断涌现，学者们除了对书院自身历史及书院制度进行研究外，还试图将书院置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之中，研究书院与学术、学派之间的关系，书院与文化的关系以及书院与科举之间的关系。

（一）书院与学术、学派

书院与学术、学派的研究方面，成果较多。吴万居著有《宋代书院与宋代学术之关系》（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该书主要是对宋代书院历史、教育精神、教育宗旨以及书院与经学、理学之间的关系的探讨。王建梁所著《清代书院与汉学的互动研究》（武汉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以苏州紫阳书院、徽州紫阳书院、扬州安定书院与梅花书院、广州菊坡精舍为例，探讨了清代汉学主要学派吴派、皖派、扬州学派、东塾学派著名学者执教书院后对学派产生的影响，以及学派兴盛后对书院的影响，以此揭示汉学与书院的互动关系；尔后对诂经精舍、学海堂的历史进行梳理，认为它们开创了书院与汉学互动的制度化阶段；最后探讨了诂经精舍、学海堂影响之下汉学书院的发展状况，试图以此呈现书院对清代汉学发展的巨大作用。

书院与学术、学派关系的研究成果中，最突出的是书院研究与地方学术、学派的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史研究兴起。因区域在范围上相对狭小，资料更为集中，以及地方政府对发掘地方文化资源的鼓励，不少学者将书院史置于区域文化的框架之中。朱汉民《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一书重点梳理了湖南书院与理学的历史，认为湖南在北宋时期有了书院创建，尔后有了理学传播的基础，并于南宋初年完成了理学与书院的一体化，形成了以书院为基地的学派。该书提出的“理学与书院一体化”观点，在书院研究中较有影响。

钱茂伟《姚江书院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版)一书, 将姚江书院归入浙东学术史的脉络之中, 对姚江书院主要学人的学术旨趣及其对书院发展的作用进行了论述, 其中对姚江书院殿军邵廷采的讨论尤详。书院是一地文化的中心, 对地方学术、文化都有诸多影响。徐雁平《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一书, 对书院在江浙文学发展中的推助之功、学术传播之用以及文士群体形成之力, 都有精彩的论述。

李晓宇的博士学位论文《尊经·疑古·趋新: 四川省城尊经书院及其学术嬗变研究》(四川大学 2008 年博士学位论文), 对成都尊经书院的学术变迁有深入的探讨。与传统书院研究将书院与学术径直对接不同, 他将尊经书院学术变化的历史置于清末特殊时代之中, 探究书院不同学术流派、风格的山长对书院学风的影响及其在书院中的冲突, 梳理尊经书院三大学术派别(成均派、南皮派、湘绮派)各自的特点、治学主张、学术倾向以及他们间的相互关联与分歧, 并对尊经学术走向分裂瓦解的过程作了细致分析。

(二) 书院与文化

20 世纪 80 年代, 国内形成了“文化热”的浪潮, 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传统文化, 发掘书院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探究书院的文化价值。丁钢、刘琪《中国书院与中国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一书探讨了传统文化对书院形成的影响、书院对儒家文化发展传播的推进作用、中西文化交织下的书院变革等问题,对书院与佛道的关系、书院与西学的关系论述相当详细。在书院与文化关系研究方面,该书是较有代表性的一部著作。

同是对书院与文化的探讨,胡青《书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文化特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则更多关注书院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作者视书院为私学,从家族文化、乡土文化重视教育的视角理解书院之兴起,虽与学界对书院起源的认识并不一致,但提供了思考此问题的另一角度;第二章论及书院的山林文化,对书院选址由山林转向城市的探讨,颇具启发意义。

书院本身即是一种文化组织,对书院与传统文化的研究是为应有之义。自20世纪末,社会文化史作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范式兴起,在研究对象上,它更多地关注观念、认同、心态等内容,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探讨个人、组织机构、群体与社会变迁的内在关系,从更多角度、纵深地呈现历史发展的细部。这一研究范式同样被应用到了书院史研究之中。肖永明《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一书,在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反思前人有关书院研究的基础之上,“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具体探讨书院兴起的社会文化环境、书院发展的社会动力、书院与宋元时期的理学及明代阳明心学之间互相结合与相互促进、书院与社会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书院祭祀的教育功能及文化内涵、书院对地域文化的促进作用等方面的问题”。该书在对书院与学术关系的探讨中,揭示出书院与学术之间的内在逻辑,突破了自

80年代以来学者们径直将书院史与学术史对接起来的书写模式，在具体的历史脉络中呈现书院的特质及其功能、历史地位，推动了书院研究的继续深入。

同样是运用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美国学者麦哲维在《学海堂与晚清岭南学术文化》（南方出版传媒、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中，围绕阮元在广州创办的学海堂，考察不同身份背景的广东士人（寓居广东的士人与珠江三角洲腹地的土著）对成为新的文化重地的学海堂的态度之差异，揭示出参与学海堂活动的流寓广东的士人如何借助学海堂这一学术机构，建构本地人身份，提升自己的地位。书中对鸦片战争后学海堂运作状况的探讨，更是其他与学堂有关的研究者较少关注的。麦哲维将学海堂的研究由书院史、学术史的领域扩展至社会文化史，为书院研究选题的扩充与深化开启了新思路。

（三）书院与科举

科举制度的形成对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教育组织之一的书院自然不能脱离科举的制约。对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学者多能识其大概。无论是通论性的著作，还是断代书院史、区域书院史的研究，都认为书院受科举影响，却少有人细心求证。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是这一研究专题最为重要的成果。他通过广泛搜集史料，揭示出宋至清不同时期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并利用统计学中的相关性分析，较为直观地呈现出书院与科举关系的紧密程度，较有新意。此外，在探讨书院与科举关系的同时，该著亦将官学的发展规模、办学质量纳入考察范围，对官学、书院、科举进行较为全面的把

握，这种宏观视野在书院研究中尤为难得。

五、结语：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书院研究的反思

新中国成立以来书院研究虽然经历了曲折，有过三十年的停滞阶段，但总体而言，取得的进步仍然相当巨大。无论是基础文献的整理，还是基本史实的呈现，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回顾、审视这一时期的研究，也会发现其中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

（一）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引入方面

自民国时期的书院研究开始，通过计量统计来呈现历史时期书院发展趋势的研究方法，即被不少学者利用。直到20世纪后半期，依旧有不少学者在书院研究中使用这一方法。计量统计在呈现较长时段的书院发展情况之时，颇为简捷直观，但在推进深层次的研究方面，则力不从心。而在书院与学术的关系方面，早期的学者多将书院发展与不同时代的主流学术径直对接起来，从程朱学到阳明学，再到考据学，将书院与学术的历史书写成了以书院为中心的学术史。这种研究方式先入为主地将历史演变的曲折、复杂过程简化为直线式的发展，其结论很可能偏离历史真实。因此，研究方法的陈旧与理论分析工具的缺乏，是制约书院研究的一个瓶颈。

自20世纪90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些理论方法（如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传播学等）传入中国开始，国内的史学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新的理论方法因为在原因解释、现象分析、研究范式之形成、视角转换等方面具有的特殊功用，迅速被历史学及其他人文学科所接受，跨学科的研究方兴未艾。但遗憾的是，这些新的

理论方法在书院研究中利用甚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社会学理论由于在现象解释、动因分析等方面的长处，正可以为解决书院研究中面临的研究方法陈旧、分析工具缺乏等问题提供助益。而且，新的理论方法的运用，也有望对书院与社会互动、书院与文化传播等新旧热点问题的研究，以及理解书院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及功用，起到推进作用。

(二) 研究视野的拓展方面

书院与教育、思想文化、地方社会等关系密切，在研究书院历史之时，理应将之置于各自具体的历史脉络之中。但就七十年来书院研究而言，不少学者是将书院作为教育组织，将其局限在教育史中，探讨其在历史时期的教育特点、功能，而对书院教育属性之外的其他方面的性质关注不够。这种局限不利于发掘书院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之下发挥的作用，更难以揭示书院原本复杂的历史面相，大大影响了书院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实际上，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组织，同时是社会大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了解把握书院的特色、地位、功能与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书院教育机构的一面，仅仅视书院为教育组织，而应该放宽视野，转换视角，探讨书院的其他面相：可以视书院为一历史范畴，探究不同时期其内涵、外延的嬗变，展现书院概念的动态变化过程；可以将书院作为地方社会场域中的一极，探讨其在地方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也可以视书院为聚合地方士人、代表地方文化的公共空间，揭示其在地方意识塑造、地方文化传承中的作用等等。历史研究需要宏阔的视野，拔除障目之叶，则能更真实地窥探历史的真相。

(三) 问题意识的增强方面

审视七十年来的书院研究，缺乏问题意识是另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前期的学者因基本史实尚未理清，他们的研究重在揭示书院的特征、呈现书院发展的大势，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后来者再重复类似的工作，则明显不够。理想中的学术研究，其出发点应是针对未能得到正确认识或者完全认识的问题而来，应以问题为导向。但在实际研究中，不少书院史论著只是停留在描述性的层次上，缺乏对现象的分析与解释，亦不能与历史中重要的问题相关联，呈现出自说自话的现象。这样的“成果”自然难以推进、深化既有的研究。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书院研究者，以书院为切入点，自觉将书院置入文化史、学术史、社会史等发展的脉络中，关注书院与文化传承、学术传播、社会变迁等产生的关联；深入探讨书院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作用的方式，避免仅仅满足于一般书院历史的呈现或者表面上的系统化，尝试通过书院这一切入点，呈现丰富、立体的历史过程。如此，当可以促进书院研究的发展，推进学术的进步。

(来源：大学教育科学 2020年第3期)

推进构建“书院制”人才培养新体系

(南昌大学校长、教授 周创兵)

南昌大学积极探索高等教育新时代命题，实施自主学习、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觉成长为主要内容的“四自教育”实践，推动本科教育“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牵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把“四自教育”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探索，探索出具有鲜明特色的“四自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着力构建“书院制”人才培养新体系。主要聚焦：目标体系主要回答“四自教育”为什么样的目标引领问题，学习体系主要回答“四自教育”为什么行的主体能动性问題，教学体系主要回答“四自教育”如何推进的客体依托问题，保障体系主要回答好“四自教育”何以能实现的机制保障问题。

构建“四自教育”目标体系，适应本科教育的未来使命

树立本科教育是担当未来的教育理念，以“四自教育”为抓手，培养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正视“未来依靠谁，如何把握未来”的战略问题。教育的使命在于把握未来。教育的真谛在于教育人们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做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本科教育在学生的学习成长中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让学生学会学习是本科教育的重要任务。

构建“自主学习、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觉成长”的人才

培养体系是践行“教育担当未来”理念的有效措施，培养自主学习意识，养成终身学习习惯。一是要唤醒学生对学习的内在渴望，要让学习成为大学生一种自然的生活状态、强烈的自我需求，凸显学习是大学教育的基本“常识”；二是要激发学生对自主学习的充分认知，把自主学习作为学生角色的“责任”；三是要教会学生掌握自主学习的方法，充分凸显本科教育中教师教书育人的“本分”，教会学生优化学习方法，学会对碎片化信息、知识的加工、整理、吸收，从而将碎片化信息转化为体系化知识，形成有机的思维能力。

树立“学习自主”“成长自觉”的成才观念，以“四自教育”为动力，激发大学生学习的主体能动性，解决大学生“如何成长，怎样成才”的现实问题。其一，自主学习是大学教育的基本前提，主要解决大学生能否学习自立的问题。当代大学生需要不断学习和更新知识，不断调整知识结构，把自主学习作为生活习惯。其二，自我管理是大学教育的关键纽带，主要解决大学生能否学习自觉的问题。自主学习、自我教育、自觉成长要依托自我管理才能实现。要从思想根源上树立起自我管理意识，从内心管理好自己、发展好自己，变他律为自律，把自我管理作为成长之路的终身修为，在自我发展中掌握主动权，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其三，自我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根本要求，主要解决大学生能否学习自信的问题。其四，自觉成长是大学教育的本质特征，主要解决大学生能否学习自强的问题，反映教育的初心和使命。成长自觉是一个人内在自我发现、外在创新的自我解放意识，是一种发自内心、

自我完善的自觉行动，是推动一个人成长的内在动力。

坚持本科教育是养成教育的教学导向，以“四自教育”为牵引，实现教育由选拔教育向养成教育转变，解决“教育何以培养人，怎样培养人”的实践问题。本科教育是大学生成才的关键环节，是教育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养人才、造福人民的关键阶段，对提高大学生能力素养发挥关键作用。本科教育不能再是为选拔考试而建设，应着眼于为何要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以及怎样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实践问题来建设。考试选拔制度作为中国最主要的人才选拔制度，提供了人才选拔的公平环境。以“自主学习、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觉成长”为牵引，充分挖掘受教育者的自觉性、主动性、独立性、协调性，并通过长期培养、反复训练、监督约束，使其养成良好教育习惯，并成为伴随受教育者一生的品质，推进选拔教育向养成教育模式转变。

养成教育是“四自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导向。通过“四自教育”让学生从选拔教育形成的思维模式、行为习惯向养成教育的思维模式、行为习惯转变。任务就是要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自主研究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使学生成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的人，使学生在大学阶段学会做人、学会学习、掌握技能、学会做事，养成良好学习习惯、行为习惯、时间管理能力、团队协作精神等并伴随一生，从而走向社会后真正成长成才。

构建“四自教育”学习体系，创新“书院制”管理模式

构建自主学习的支撑体系，优化“书院制”学习环境。为适应学生自主学习需要构建学习支撑体系，南昌大学成立“际銮书院”，作为学校实体性的教学组织机构，着力打造拔尖创新人才的实验平台，建设书院制整体空间，推进学术活动进书院、宣传文化阵地进书院、第二课堂进书院，营造书院式学习氛围，书院内配置智慧教室、研讨室、虚拟仿真创新实验室、图书资料室等自主学习场所，为学生自主学习、研讨交流、图书资料阅览和小型报告提供硬件支持，促进学生相互学习、相互融合，营造书院良好的自我教育氛围。

构建自我管理的制度体系，优化“书院制”管理机制。有针对性制定书院制学生自我管理机制，为每位学生配备自我管理手册，设立学习目标管理、时间管理等栏目。管理好自己的学习目标，将学习目标学习阶段分解成一个个力所能及的小目标，通过完成这些小目标最终来支撑整体目标的实现。管理好自己的时间，合理地运用零散时间，对自己的专业学习、社会实践、业余生活等进行合理的规划和时间安排。管理好自己的兴趣，围绕兴趣制订自己个性化的学习计划，把兴趣作为自己未来职业发展方向。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制定和实施有益的身心锻炼活动，养成受益终身的良好习惯，成就健康体魄。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使学生学会对情绪进行有效管理。管理自己的人生规划，学会自己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合理规划人生轨道。

构建自我教育的体验系统，搭建“书院制”教育平台。大学生的自我教育就是在引导学生认识自我、挑战自我、战胜自我。

际奎书院通过构建六大体验系统，搭建大学生自我教育平台。通过诵读红色家书、革命文化实践研修等主题实践活动，构建“红色基因传承”理想信念教育体验系统。通过“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各类重大赛事选拔，促使学生学科交叉组建团队、以赛代练、以赛促学，构建学习竞赛体验系统。通过“阳光长跑”等活动，构建体育教育体验系统。通过设立劳动课程等，构建劳动教育体验系统。通过理论宣讲等社会实践活动，构建实践教育体验系统。通过在书院设立心理健康室、星火引航岗，开展朋辈互助，构建朋辈互助心理体验系统。

构建自觉成长的评价体系，建立“书院制”考核制度。自觉成长是通过自我发现、外在创新有意识地将自我本体发展成熟的过程。书院通过建立《际奎书院构建拔尖创新人才“三全四自”育人体系实施意见》《“四自”教育素质测评实施细则》《“四自”教育奖学金管理办法》《“四自”教育荣誉称号评选办法》等“书院制”拔尖创新人才考核制度，唤醒学生的内在需求和欲望，使其获得主动发展的动力与热情。

构建“四自教育”教学体系，创新书院制人才培养模式

推进小班化教学改革，实践自主学习的书院教学模式。际奎书院积极推进教学方式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通过研讨式小班教学，将“研读、精讲、研讨、互动、启发”融入教学，将教师在研究领域的新观点、新视角、新发现引入教学，坚持课内与课外、科研与教学、理论与实践、动脑与动手相结合，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激发学生的

兴趣和潜能，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激发求知欲望和创新思维，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变接受性学习为研究性学习。

创新个性化培养机制，构建自我管理的书院培养体系。际奎书院积极推进个性化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唤醒学生自我管理的内在动力。以兴趣为导向，充分尊重学生对学科专业的选择，实行“完全学分制”，打破专业壁垒，淡化学科界限，构建了数千门供学生自主选择的“通识课+学科基础课+跨学科基础课+专业主干课+跨专业选修课+科研训练课”组成的学科交叉融合、专业互通集成的多学科一体化课程体系，实现多学科融合贯通培养。根据不同学生特点和个性差异，由学生自主定制个性化培养方案，自我规划学业，自我管理学习与空间，从而唤醒每一个学生的优势潜能。

建设多样化学习模块，创新自我教育的书院学习模式。际奎书院引导学生进行多样化学习模块，通过这些学习的日积月累和潜移默化，真正实现自我意识基础上的自我教育。一是根据不同专业和课程自主组建了不同类别的课程学习模块，实现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学生对同一课程交流研讨。二是组建各类书法、绘画、辩论、唱歌、电影等兴趣学习模块，以培养兴趣爱好缓解学业压力。三是根据不同双创项目构建科研训练模块，自主组建团队进行实验或开展科学研究，鼓励学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在项目中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和创新思维。四是根据不同重大学科竞赛组建学科竞赛模块，在竞赛中激发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团队精神。

健全多学科导师制度，建立自觉成长的书院指导体系。际奎

书院积极营造以“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为荣的育人氛围，激励引导校内外造诣深厚、德才兼备的学术名家参与拔尖人才的教学与指导，构建起科研导师、班级导师、生活导师、校外导师的多元化导师制度。导师通过指导学业发展规划、学习方案制订、科研训练、毕业论文撰写、社会实践等各个教育环节，为其指明方向、搭建平台、营造氛围、提供养料，从而让学生在学习、实践中激发潜能、增加见识、锻炼才干，实现自觉成长。

构建“四自教育”的保障体系，推进书院制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加强“四自教育”组织保障，牢牢把握书院制办学方向。南昌大学拔尖人才培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融入书院制教育全过程各环节。学校成立拔尖学生培养工作领导小组、拔尖学生培养专家委员会、际奎书院院务委员会等机构，由校长担任组长和主任，负责拔尖学生培养工作的整体决策、规划和政策措施的制定，统筹、调配和落实支撑“四自教育”的硬件建设经费，指导拔尖学生“四自教育”全过程、监测跟踪和综合评价，为“四自教育”的落实、落地、落细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健全“四自教育”制度规范，把制度贯穿书院建设始终。教育是一个长周期慢变量的过程，要通过健全的制度规范驱动学生的内生动力，给予更多的成长空间，推动学生践行“四自教育”常态化。一是建立“四自教育”名家引导机制。邀请科学名家、杰出校友、思政专家到书院讲学，通过大师的言传身教，引导学

生知行合一，践行四自教育，成为社会精英、国际名流、杰出校友、国家栋梁。二是建立“四自教育”优秀教师参与机制。制定向“四自教育”指导教师倾斜的业绩考核、职称评聘等政策，实行导师特殊津贴制度。三是建立“四自教育”考核激励机制。通过科学合理、切实可行、与培养目标相适应的“四自教育”考核体系，客观评价学生在“四自教育”过程中体现出的社会责任感、人文素质、数理基础、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同时充分发挥评价激励体系的指挥棒作用，积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自我教育和管理水平、自觉成长的动力。

建立“四自教育”协同机制，以合作融入书院管理全程。学校在拔尖学生育人实践探索中，始终把实施协同育人作为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抓手，在“四自教育”的实践探索中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推进协同合作。一是创新“四自教育”协同管理机制。际奎书院实行“一体化管理、多样化培养、开放式运行”的管理体制，成立由校长兼任主任、相关培养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书院院务委员会，审议和决策拔尖学生“四自教育”践行过程中的重大事项。二是优化“四自教育”协同育人机制。统筹学校专业、学科、人才和平台等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实现学生践行“四自教育”的科教融合和协同创新的育人机制。三是整合国内外协同育人资源。通过博雅讲坛、名师讲坛、校外导师等平台汇聚国内外学术大师、知名人士参与拔尖学生的“四自教育”培养，通过大师引领激发学生自觉成长的内生动力。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 2021年第2期）

高教信息

2021年 第4期 (总第97期)

责任编辑: 马建琴 何芹 李雯

出版时间: 2021年8月15日
